



文化后院的眷恋

——彭定安学传

武斌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文化后院的眷恋 ——彭定安学传

武斌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后院的眷恋:彭定安学传/武斌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6

ISBN 7-205-04277-1

I. 文… II. 武… III. 彭定安-传记 N.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405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50 千字 印张:15 $\frac{1}{2}$ 插页:5

印数:1—500 册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英纬

版式设计:王珏菲

封面设计:晓 兵

责任校对:王绍斌等

定价:26.00 元



1996年7月17-19日,彭定安在阜新参加“王占君作品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言



1996年12月,彭定安与辽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兆林、邓刚在全国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上



彭定安在 197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与伯尔夫人、翻译家安妮·伯尔合影，左为夫人曾景云 (1992, 德国, 科隆)



彭定安在美国尼亚格拉大瀑布之游览船上留影，左二为次子彭为民 (1994)

绪 论

《彭定安学传》 与学人彭定安

关于本书的书名，称“学传”而非“评传”，似有必要先做一点解释。

我选择用“学传”这个词，首先因为本书的传主——彭定安是一位“学人”，甚至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真正的学人。或者也可以说，他主要是以学人而存在的。他过的是一种学人的生活，他的人生之旅主要是文墨生涯，而且他认为文墨生涯是人生中可能的最好的生涯，因而是他的热烈的志向，至少是他最适合的生存方式。

“学人”这个称谓，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还有“学士”、“文人”、“读书人”等用法。《史记·儒林传序》说：“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是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人群。但是，“学人”所指称的决不仅于此，它更指的是一种生存方式、

一种生活情态、一种精神样式、一种对人生境界的思考、理解和实践。在英语中有一个与“学人”大体对应的词“Letter”，一般都把这个词翻译成“文人”。在很多情况下，“Letter”主要是指欧洲启蒙运动中的文人学士，他们不是某一领域、某一专业里的专门家，而是符合或代表那个时代理想的、有教养而又献身于文墨生涯的博学之士。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学人”或“文人”或“Letter”都是指这样一群人，他们固守着人类精神文化的家园，思考着世界和人生的终极价值，培育着世界上最美丽的思想之花。

彭定安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学人的生活，至少他是热烈地向往着、寻找着、追循着这样的生活。我在这部“学传”中首先要考察的、描述的，就是他作为学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情态、精神样式，以及从这些方面所反映、所表达、所折射、所映照的人格品质、价值理想、人生态度和心灵世界。由此，我们似可看到一个被称作或自称作“学人”的人是怎样或应该怎样生活的。

学人的“工作”是“做学问”。学问有各种各样、多种多样。凡人生、社会、世界、宇宙，都是学问的对象。学问有大小之别、高低境界之不同。然无论做的是什么学问，凡成功者、有成就有建树者，必有一基本的条件，就是“投入”，全身心的投入，即把自己的全部或至少是主要的精力都贡献给学问的事业，除了学问本身的价值不追求、不遵循其他价值。这样一来，学问与生命融为一体，做学问便成了学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学问是学人存在的基本价值。他与社会的沟通、他向社会的表达、他对社会历史文化的贡献，以及他人（社会历史文化）对他的了解、接受和评价，主要是通过他的著作、论文、意见、学说、思想。他主要是通过他

的论著和思想而存在的。因而，论著和思想便成了他的生平事业（也就是他的传记）的主体内容。学人的传记主要是思想学说的传记，是学术性的传记。这是我所谓“学传”的第二层含义。我在这本“学传”中将用一半以上的篇幅介绍、分析、论述和评论彭定安的论著和思想，他的学术事业、学术成就、学术理念和学术价值。我们将通过他的学术思想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并进而了解他的“这一个”人。

说学问与生命融为一体，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追求对自己学问理想的实践。古来中国的学术传统是讲究信仰与实践、文章与操守的统一，中国文人在博学多识外，更追求人格精神和价值理想。甚至，在他们那里，对人格修养、道德操守的重视，远在学问本身之上。荀子《劝学篇》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当然，学问、学术活动作为人类文明精华的体现，作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传承方式、传承统绪，自然会给人以巨大的精神滋养，熏陶、培育、锻造人的心灵世界、人格品质、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所以，当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学问事业的时候，当一个人可以真正地说是以学问为自己的生命价值，即所谓“君子之学”，那么，他必具有了文人的风度、气质、情怀和趣味。操守之如何可品评其学问之高下。如若不然，何以为学呢？

学人的学问是通过学习获得的。人类文明的历程，就是一代一代人持续的、不间断的学习、理解、接受和发挥以往文明成果的过程。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包含着每一代人的选择和创造性。于是，文明和文化就进步和发展了。个体也是这样。凡有成就、有建树、有贡献的学人、学者、学问家，都是站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所以，他首先是一个善

于学习的人。善于学习也许可以说是人生成功的一个关键。彭定安就是这样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他的成长、发展、进步乃至创造性的收获，首先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学习的过程。在漫漫人生之路上，他始终保持开放的姿态和积极热情的态度，向书本学习，向生活学习，向社会学习。所以，熟识他的人都说，彭定安的讲话和文章总能给人新鲜感。因为他是与时俱进的。我在这本“学传”中将描述和分析他的学习的经历和过程。这是我所谓“学传”的第三层含义。现在，我们正走向信息社会，“学习”在这个时代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有人提出，我们正面临一场“学习的革命”。那么，彭定安的学习精神、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经验，都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所以，这是一本关于一位“学人”——彭定安先生的“学习”经历和“学问”发展历程的书。再所以，我名之为《彭定安学传》。

二

学习和做学问，别无他骛，这样的学人的生活应该是怡然自得的。其实不然。中国的学人或者说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传统，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发自内心的表达。这种传统决定了中国学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实践精神。自孔子以降，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密切地关注社会现实生活，积极主动地参与现实生活，并力图使自己的学问为世所用。第二是忧患意识。《易

传·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种忧患意识是对宇宙人生的忧患，对文化兴衰的忧患，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也包含对自己经世致用的社会理想的忧患。这种忧患意识，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振奋努力，困勉力行的心理动力。第三是悲剧性格。这种性格突出表现为他们对于价值理想的执着追求，或经离乱困厄，或遭生活磨难，或不被世人所理解，而矢志不悔。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宋明理学概述·序》中说到自己的治学经历，或透露了这种性格的一些信息。他说：

……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其学。虽经离乱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矩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敢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其匹夫有其责。……

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三种特征或传统更由于内忧外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加深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例，虽然他们激烈地反传统，但他们的出发点和价值归宿却正是这种自古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这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深层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由于以上所说的三种传统，他们个人的命运就与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的境遇以及他们对这种境遇的心理反应方式，他们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他们的心路历程和价值

追求，都受到时代的巨大的塑造和影响，具有明显的时代的痕迹。从一个人身上，从一个人的经历、遭遇和成长的历史中，可以反映出时代的特征以及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关于时代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牟宗三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

假定知识分子本身的生命能够顺适调畅，在正常的发展中完成他自己，这必是一个健康的时代，所谓太平盛世也；否则，知识分子的生命发展不顺畅，自我分裂，横撑竖架，七支八解，这个时代一定是个乱世，不健康的时代。^①

那么，彭定安的经历和生活故事，对于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认识作为他的同时代人的那个知识分子群体就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彭定安的经历是有典型性的。他很早就经历了国家危亡和家庭困顿的生活磨难，在生存危机的各种艰难困苦中磨砺了他的生命意志。在青少年时代，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向往光明、向往革命，并亲身投入到革命的激流中。他以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以如诗如歌的激情去创造生活。但是，在1957年的政治大风浪中，他与许多和他一样的青年知识分子遭遇了始料不及的厄运。而到“文革”时期，“左”祸横行，他的尊严受到践踏，心灵受到摧残，热情和理想受到沉重打击。而至最后，被流徙边陲一个偏远荒凉的小山村，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远离现代文明的所谓“五

^① 《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七道路”的蹉跎岁月。无论对于谁来说，这样的困厄与磨难都不是一种幸运。然而，彭定安并没有被这不幸的命运所压倒。他虽屡遭危机而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向往，多受苦难而执着于自己的人生信念和理想追求。所以，他“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其学”。不仅如此，当他沉入到社会的最底层，过平民百姓生活的时候，使他有可能会接触到、了解到许多在书本上无从获得的生活的真实，促使他有可能进行理性的、冷静的独立思考，有可能获得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更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也更强化了他的忧患意识，强化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患。这时的“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既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①

所以，当10年“文革”结束以后，彭定安没有沉湎于对往昔不幸遭遇的回忆、抱怨而耿耿于怀（虽然每提及此，对青壮年时代的岁月蹉跎充满惆怅的心情），而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大时代中，投入到新生活的创造中。从那时到今天的近20年中，他出版了十几部学术著作，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研究领域广及文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创造了斐然可观的学术成就。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知识分子中流行一个口号，叫“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彭定安就是以这样的心情和态度投身于工作的。这也是当时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他们要把时间“抢回来”，意味着珍惜今天

^①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21页。

的生活，珍惜今天有了施展才华、报效国家和民族的机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付出更多的生命支出。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敬可爱之处。无论他们遭受何种委屈，何等磨难，一旦有了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机会，他们便不计前怨，不计得失，不计个人进退荣辱，而是把自己的全部智慧、才华和热情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中。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自古以来，“文章憎命达”。在彭定安那里，痛苦和磨难成为生活对他馈赠的一种精神财富，使他在新时期的学术生活中，锲而不舍，特立独行，立言立德。

三

彭定安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学人精神的现代学者。在他的学术活动中，在他的学术价值理想中，始终如一的是中国传统学人的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和追求，是对文化传统的无限眷恋的深厚情感。在他困居乡僻的时候，他结合自身的命运和感受，思考最多并为之痛苦最多的是文化的困厄和毁灭。在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中，他关心最多并谈及最多的是文化的发展与建设。他多次撰文，呼吁在繁华与喧嚣的现代经济社会中，建设自己的文化“后院”，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发展“工具理性”的同时更要重视“价值理性”；发展高科技的时代更应该是宏扬人文精神的时代。他把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无论是他的鲁迅研究、文学研究、创作心理学研究，还是社会发展研究，都贯穿着、体现着他对文化的关怀和关注，并且都置于广阔的文化大视野之下来思考和探索。文化是他学术研究活动展开的一个“屏幕”，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更是他价值追求的

出发点和归宿。

彭定安是一位具有现代观念和世界意识的学者。他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在现代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的演变和发展中，在与世界学术文化的对话中，观照、思考和探索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趋向。他的研究领域广博宏阔，从鲁迅研究到文学研究、美学研究、创作心理学研究、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以及现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并且在所有这些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的独特创建和建树。他具有坚实的国学知识基础，然而他的心灵是始终向现代世界开放的。他广泛地研究、吸收和融合现代西方的文化思潮和理论成果，并经过批判性改造而纳入到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中。他是一位站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而兼通世界学术的学者。所以，在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中，始终以“贯通”和“整合”为主要的精神，在专业上通于文化整体，在学理上会通中西，在感情上融会古今，从而形成了他的学术境界、学术品格和学术话语。

彭定安是一位具有浓重感情色彩的诗人型学者。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大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往往都是诗人。他们能敏锐地感觉到认识的诗意。他们那大胆的概括、果断的思想和种种发现，也许多多少少应归功于这种感觉。……真正的学者和作家是同胞兄弟，他们同样懂得，无论在科学中还是在艺术中，出色的生活内容同样都可以得到表现。”^① 彭定安不是把自己困囿在狭窄的书斋里，而是直接面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生活现实，满腔热情地读世界这本

^①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面向秋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262页。

永无尽头的大书。他密切地关注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发展，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从生活实践中获得精神的滋养和创作的灵感，并把这种现实关怀和从现实生活中的获得贯穿于、融会于学术事业中，所以在他的学术论著和学术活动中，总是洋溢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充满着深沉的自身情怀。他是以热爱生活的诗情去从事学术事业的。学术事业并非无需感情，相反，它正是需要学者以全部的生命激情所献身的事业，即陈寅恪所说的那种“同命而共尽”的事业。学问起源于激情和想像，需要理性和良知来灌溉，更需要用生命来承诺。台湾作家董桥说：“今日学术多病，病在温情不足。温情藏在两处：一在胸中，一在笔底；胸中温情涵摄于良知之教养里面，笔底温情则孕育在文章的神韵之中。短了这两道血脉，学问再博大，终究跳不出奔奔荡荡的虚境，合了王阳明所说：‘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读彭定安的文章，常感其笔端激情奔放，文采飞扬，这正是他胸中澎湃的生命激情的流露，是他对这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眷恋之情的升华。更重要的是，他时时不敢忘怀作为一位现代学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他记着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的话：

学者的真正使命是“高度重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学者“应当把自己为社会而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①

①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39页。

在这本《彭定安学传》中，我们将分析和描述彭定安的学术品格和学术境界，追踪和评说他的学术事业的发展道路。同时，我们还将走进他的心灵世界。

目 录

绪 论 《彭定安学传》与学人彭定安	(1)
-------------------	-----

第一章 人生的开端与觉醒：在从小康坠入困

顿的途路中	(1)
一 向世界的最初眺望	(1)
二 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家庭变故	(8)
三 艺术的补偿与文化的熏陶	(15)
四 艰苦而勤勉的中学生活	(28)

第二章 告别乡关，去读社会这本大书

一 心理流浪的时期	(40)
二 旅居南昌，走向新生活的起点	(46)
三 曾景云	(58)
四 短暂的军旅生涯	(63)
五 彭涛	(69)
六 从鄱阳到北京，文化场景和精神气候 的转换	(74)

第三章 在文墨生涯中初试锋芒

一 “出关”之后的“全面学习”	(84)
-----------------	------